

《女孝经》东传日本考略

杨 欣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女教书”，主要指有关妇女道德教育的书籍。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明时代，也是女教书撰写兴盛的时代。《女孝经》正是产生于唐中期的一部重要的女教书，由唐朝散郎侯莫陈邈妻郑氏撰写。据郑氏书前《进书表》自云，因侄女策为永王妃“少长闺闱，未闲诗礼”，故作此书“诫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全书模仿《孝经》，分为十八章，以汉代女教圣人班昭与诸女对话的形式，阐述了与后宫女子生活有关的一些训诫性内容。此书后来东传日本，并对日本近世女训的编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女孝经》传入日本的时间

关于女孝经传入日本的时间，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来看，大致有四种可能。

第一，唐时传入。

此种说法主要依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记载。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9世纪末，已有女训书籍传入日本。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汉籍目录学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孝经家”下载：“《女孝经》一卷，班婕妤（妇？）撰。”^①

按：现存日本室生寺抄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原题《本朝见在书目录》。日本阳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间（唐僖宗乾符三年至唐昭宗光化元年，876—898）由时任天皇文学侍从、兼任图书寮大学头的藤原佐世奉敕编撰。此书主要记录了日本九世纪后半期图书寮、大学寮、弘文院、校书殿、太政官文殿等国家公务机构，以及天皇私人藏书处如冷然院、御书所等处实际收藏汉籍的情况^②。其中所录汉籍著作几乎全是中国文献，收书数目大致相当于《隋志》的九分之一，“两唐志”的二分之一，也相当于当时唐一半以上的书籍，堪称九世纪后半期日本全国官方收藏汉籍的总目。该书成书晚于《隋书·经籍志》240余年，早

①[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第七“孝经家类”，（清）黎庶昌辑《古逸丛书》，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扬州古籍出版社发行，1990年，第738页。

②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于《旧唐书·经籍志》50 余年、《新唐书·艺文志》150 余年。显然,其所具有的文献学和目录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不少唐代文献没有收入“两唐志”,但已传入日本且载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据书前“进表”,《女孝经》大致成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之后,当时正值日本遣唐使赴唐,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高峰时期。日本为了进一步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和他文化,从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间,正式任命遣唐使十次,包括迎入唐使一次,送唐客使二次,实际成行七次^①。遣唐使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从中国搜购各类典籍,大致以佛经、儒家经典、文史、天文历法等为主。当时日本各类各级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都是中国的儒学经典。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孝经》在唐代极为盛行,东传日本后,遂也成为学校主要教科书之一^②。749 年,桓武天皇移居新京之后,日本开始进入“平安时代”。日本权利阶级与知识阶层自觉地渴望学习中国的文化,朝野上下,尚汉成风。860 年,清和天皇命全国采用唐玄宗注《孝经》。

而《女孝经》全篇仿《孝经》之例,采诸经传。其成书的时间,正是社会上《孝经》流行的时期,因此《女孝经》产生后不久,即随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等传入日本,是有可能的。

第二,宋时传入。

严绍璦认为,现存日本室生寺抄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非原本《本朝见在书目录》,而是经过后人的添加整理。因为抄本中不仅收录了冷然院烬馀之书,还有出自冷泉院之书目。这样的话,成书时间则在 954 年之后^③。那么《女孝经》的传入时代也可能随之推迟至宋。

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强调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观念,重视对女子的妇德教育。《宋志》、《崇文总目》等官修书目及王应麟《玉海》等类书中都有关于郑氏《女孝经》的记载。当时文人们还纷纷以《女孝经》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书画作品,以加强此书的训示效果,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和普及的作用。因此《女孝经》或于此时传入日本,为公家所藏。

但这种观点还是值得怀疑。

《见在书目》著录《女孝经》作者为班婕妤(妇?)。班婕妤,即汉女教圣人班昭之祖姑,事迹见《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传》,未曾见有《女孝经》之类的女教书传世。此其一。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杂家类”下载:“《女诫》一卷,汉曹世叔妻

①有关这一百多年间遣唐使的情况,请参考《遣唐使一览表》,载[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63-72 页。

②林琳:《唐宋时期中日图书交流的特点初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第 14 页。

③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 97 页。

班昭撰,固之妹也。俗号《女孝经》。”^①是陈振孙生活之时代,人们普遍将班昭之《女诫》叫做“女孝经”。据现有资料来看,叫《女孝经》的书除了郑氏《女孝经》和班昭《女诫》外,没有别的书。既然陈振孙所言之《女孝经》系班昭《女诫》,那么《见在书目》所载之“《女孝经》一卷,班婕妤撰”亦有可能是班昭之误。

不过在《见在书目》“杂传家类”下还有“《女诫》一卷,曹大家撰”^②的著录。班昭,嫁曹世叔为妻,后受诏入宫,为皇后及诸贵人师,故号曰“大家”。所以《见在目录》中的《女孝经》也可能并非班昭的《女诫》,故被分著于两处。

而且除了《见在书目》外,并无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记载可以佐证《女孝经》在唐宋时已传入日本。因此《见在书目》的记录是否可信,此《女孝经》究竟为何人所撰,是否为郑氏之《女孝经》,都无法确定。

第三,明永乐年间官方赐书。

《明史·日本传》载,成祖永乐六年(1408),日本第五次遣明使回国之际,“求《内训》、《劝善》二书。太宗许之,各赐一百本。”^③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九子部一儒家类:“明刊《内训全书》八种,冠以仁孝文皇后《内训》、次郑氏《女孝经》二卷、《女论语》一卷、朱天球《女范》三卷、《七言孝经》一卷、《训女四字经》一卷、《训女三字经》一卷、《女小学》一卷。”^④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九“郑氏女孝经”条下也有:“祁承燾:载《内训全书》。”^⑤

但此说也有不少疑点。首先,《女孝经》是否由官方所赐并无明确记录。《明史》只载《内训》、《劝善》二书,其中是否杂有郑氏《女孝经》尚不得而知。其次,据山崎纯一介绍,日本现存最早的《女孝经》注解本是明万历十七年(1590)黄治征注、余应虬校的《新绣郑氏女孝经句解》。既然永乐六年《女孝经》已随《内训》等书一起传回日本,为何直到近二百年后才出现最早版本呢?第三,从遣明使的身份来看,除第一次勘合贸易以外,其余18次出使中国的正副使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山高僧”。他们对汉籍的需求多以佛典为主,外书主要为诗文集、儒书、史书等,至于女教书则不在其列。另外,当时日本正处于室町时代(1333-1573)中后期,女教并未得到普及,加上由于汉文阅读困难,故儒家女训对于文化普遍不高的庶民女子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种种因素结合起来看,很难认定《女孝经》此时即已传入日本。

第四,明万历年间,因商业贸易而传入。

与前述几种说法仅为文献记载不同的是,这种观点有实物证据。据日本学

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3页。

②[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第二十“杂传家类”,《古逸丛书》,第744页。

③《明史·外国三·日本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345页。

④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76页。

⑤(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680册第585页。

者山崎纯一不完全调查,日本现存最早的《女孝经》注解本是明万历十七年黄治征注、余应虬校的《新绣郑氏女孝经句解》。万历年间,中国民间版画达到了一个高峰。从此书题目来看,《新绣郑氏女孝经句解》当是明代书坊为《郑氏女孝经》原书配插画后印刷出版的本子。由于图文对照,互相补充,增强了说教的效果,于是这本黄注的《女孝经句解》也很快通过商业管道,在民间书籍贸易中传入日本,并流行开来。

二、《女孝经》在日本的流布及仿作

虽然《女孝经》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还不能最终确认,但对该书在日本的影响力的考察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分析。

1. 日本社会基本状态与《女孝经》所宣传的思想的匹配程度

在平安时代,日本社会婚姻形态为招婿婚,女性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此时期《女孝经》这种宣扬男尊女卑,教导女性对男子绝对服从的儒家女训并不适应当时日本社会状况^①。加之汉字阅读理解的困难,如果没有相当的汉学素养,《女孝经》一书也是很不容易习知的。因此,即使《女孝经》等儒家女训在唐时已经传入日本,其影响力也只能局限于能够受到良好文化教育的宫廷或贵族女性之中。

进入镰仓(1192-1333)、室町时代(1333-1573)以后,随着女性地位的下降,以女性为对象的训诫书逐渐问世。然而此时女性地位尚未跌入低谷,在家庭及婚姻生活中还享有对子女的亲权,丈夫去世后担任家长,及管理处置家庭财产等一系列权利^②。故这一时期女教书籍数量很有限,《女孝经》仍然没有获得广泛传播和普及的土壤。

而到了近世的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儒家思想的兴盛以及强调男性家长权威为特征的家族制度建立,日本女训才进入了全盛时期。李卓《日本家训研究》一书称:“这时中国儒家女训大量传入日本。同时人们又仿照中国女训开始编撰本国的女训书籍。女训书数量大大增加。”由于其强调三从四德,女子对男子绝对服从的观念切合了时代要求,《女孝经》的影响迅速扩大。江户时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贝原益轩(1630-1714)在他的《和俗童子训》(1711)一书中认为当时少女七岁学日语假名,而后读古词、《女孝经》等等,传授孝、顺、贞、洁之道。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模仿和借鉴《女孝经》而创作的系列女训作品。

2. 江户时代的仿作

这一时期仿作的女训文献,按其特点又可分为前后两期:

^①王慧荣:《日本女训中的贞节观探讨》,载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办“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网”;http://www.tjnu.edu.cn/women/chinas/xuezhewenku/yjs/yjs_5.htm

^②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1)前期(1603-1683)在内容和体例上均深受中国女训的影响,以面向社会上层女性为主要训诫对象,侧重模仿与编译。代表作有《女训孝经》、《女四书》和《女式目》。《女训孝经》是对《女孝经》最早的直接借鉴,实际是把《女孝经》原封不动地标以假名注释。

随后计原元甫于日本明历二年(1656)以日文假名改写《女四书》,收录了《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四部作品,这是日本最早出现的《女四书》翻刻本。与之相应的中国的女四书是班昭《女诫》、仁孝皇后《内训》、宋尚宫《女论语》、以及其母刘氏所作之《女范捷录》四部书的合称,其最早版本是1624年的《闺阁女四书集注》。而计原的书有《女孝经》却无《女范捷录》,由此也可想见《女孝经》一书在日本的影响力。明治维新以后,相继出现的一系列女四书如《和解女四书》(1883)、嘉悦孝子《女四书评释》(1911)、《女四书》(1912)等,大都收录了《女孝经》而舍弃了《女范捷录》,这恐怕是因为《女孝经》更加符合日本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大抵与明治维新之后兴起的“良妻贤母”主义思潮有关^①。

这些书吸取原书主旨的同时,内容上经过作者自由增删改动,体现了一定的独创性。如《女孝经·三才章》:“大家曰:‘夫者,天也。可不务乎?古者女子出嫁曰归,移天事夫其义远矣。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而人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防闲执礼,可以成家。’”而嘉悦孝子《女四书评释》中说:“女子在家尊父如天,嫁后尊夫如天也。天为阳,生万物,地为阴,育万物,地从天,此乃天地之道也。女子在家尊父,既嫁尊夫,此乃女子孝道之行也。”^②虽然文句表述上没有一句与原文相同,其主旨仍是男女之别拟作天地、阴阳之别,要求女子对男子顺从、恭谨。

成书于1649年的《女式目》是在吸取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儒家伦理内核的同时,糅合了日本的神道女性观、佛道女性观,及作者的个人理念等形成的一部女训作品。该书体例和《女孝经》极为相似,都是针对不同阶层身份的女性分别讲述规范。其次,都强调女性应识文断字,丰富学养。《女孝经·贤明章》有:“诸女曰:‘敢问妇人之德,无以加于智乎?’大家曰:‘人肖天地,负阴抱阳,有聪明贤哲之性,习之无不利,而况于用心乎!’”《女式目》关于“学艺”则有如下一段:“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所受,然首先应学艺、写文章。如

①“良妻贤母”主义: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接受西方文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女性观和女子教育观。目的在于培养塑造出与社会上层男子相匹配的女性,同时注重教育孩子所应具备的品质。由于儒家女训中所规范的女性形象适应了时代要求,故被当作理想典范而加以提倡。山崎纯一在《关于唐代的两部女训书〈女孝经〉和〈女论语〉的基础研究》一文中认为,计原收录《女孝经》舍弃《女范捷录》的理由正是由于其具备了“良妻贤母”主义之女性观、女子教育观。

②转引自张玉姣:《近世女子教育初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第8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不谙此道,则一生中不识善事也不辨恶事,既无乐趣,又无慰藉。”^①与《女孝经》“劝学”的思想接近。

这几种女训都是以上层女性为训诫对象,篇幅冗长,比如《女训孝经》有上下两卷,共十八章;没有一定的财力物力无法付梓刊行,另外也给携带和阅读增加了困难。故而此类书籍多流传于上层,在庶民中影响不大。

(2)后期(1684—1807)以庶民女子为主要训诫对象,内容以浅显易懂的德目说教为主。为适应庶民女性读书识字、普及文化的需要,多将前期深奥的女训进行缩写、改编。在此背景下,简明扼要的《女大学宝箱》(1716年)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

《女大学》是后人依据江户时期朱子学派大儒贝原益轩的《和俗童子训》第五卷的“教女子法”编撰而成的。它将儒教女训集《女四书》进行概括总结,并被当作日本江户时代女训的根本依据。

但是《女孝经》为女子所作,乃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指导女性如何遵循妇道,恪守本分,以求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显然具有与广大女性感同身受,惺惺相惜的主观倾向。而《女大学》的作者为男子,书中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妇女的歧视。如其认为“女人属阴性,和夜晚一样黑暗,所以女人比男人愚笨”^②,自然要服从男人,唯夫是从。而《女孝经》认为妇女应成为丈夫强有力的合作者和道德榜样,只有这样,才尽到了作妻子的责任,这实际上肯定了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为人母的问题上,《女孝经》也非常重视母亲教育子女的责任,尤其是对男孩子的影响。而《女大学》则认为女子比男子愚笨,由这样的人教育孩子,“会因为溺爱惯坏孩子”^③,故女子根本不具备教育孩子能力。如此等等都反映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女训书籍结合本国情实所发生的改变。

综上所述,这些女训虽大都是在吸收、模仿、借鉴《女孝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又结合本国的社会现状,根据不同时代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加以吸取,但《女孝经》作为成为日本近世女训的根本依据之一,在日本女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对日本近世女子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成都地铁有限责任公司

①转引自〔日〕笈久美子:《中国的女训于日本的女训》,李卓主编:《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②转引自李卓主编:《日本家训研究》,第287页。

③转引自李卓主编:《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第238页。